



# 大卫·李嘉图 百年评价

[美]雅各布·霍兰德著

商 务 印 书 馆

K835.6153/1

# 大卫·李嘉图

## 百年评价

[美]雅各布·霍兰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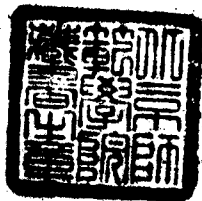
刘震东译

陈彪如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9852



商务印书馆

1979年·北京

739852

**DAVID RICARDO**  
**A CENTENARY ESTIMATE**  
BY  
**JACOB H. HOLLAN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10

**大卫·李嘉图**

**百年评价**

〔美〕雅各布·霍兰德著

刘震东译

陈彪如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〇七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4 1/4印张 85千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册  
统一书号: 4017·202 定价: 0.35元

## 前 言

1910年春，作者在哈佛大学为了纪念李嘉图第一部重要著作《金块的高价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出版一百周年发表了三篇讲演，本书就是由这三篇讲演组成的。

## 出版说明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主要著作是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从事经济研究活动，是从论述货币问题开始的，曾写过不少有关货币问题的文章、小册子和札记。他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是一本题为《金块的高价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的小册子，出版于1810年年初。

1910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为了纪念这本小册子出版一百周年举行一次纪念会。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霍兰德曾在这次纪念会上发表了三篇讲演。这本《大卫·李嘉图：百年评价》就是由这三篇讲演组成的。

雅各布·霍兰德（1871—1940）毕业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曾任该校财政学副教授，并在政府中担任过一些有关金融和财政的职务，后于1904年被任命为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除本书外，他还著有《国税的研究》（1900）、《经济自由主义》（1928）和《匮乏与丰富》（1932）等书。

作者在本书中概略地叙述了李嘉图生活时代的历史背景，并按李嘉图早年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其后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并从事写作，以及晚年从事政治活动的几个阶段，介绍了李嘉图的一生。书中对李嘉图的主要著作及其经济思想体系作了简略的分析，对于李嘉图和他的同代经济

学家如穆勒、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等人的交往关系也有所描述。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李嘉图及其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材料；同时，由于本书是在1910年发表的，我们也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本世纪初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李嘉图经济著作的某些看法。因此我们把它翻译出版，以供读者参考。当然，作者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分析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李嘉图及其经济思想的论述为指针，对书中的观点进行分析。

## 目 录

一、生平.....	1
二、著作.....	48
三、影响.....	107

## 一、生平

1876年5月31日，伦敦隆重地举行了一次庆祝《国富论》出版一百周年的纪念会。许多有名望的政论家和学者应历史悠久的政治经济学会的邀请参加了这一次集会。主席是英国首相，出席的贵宾有法国财政部长。一些学识渊博的演讲人以热烈和同情的心情来评价《国富论》出版以来所产生的比较重要的影响，并估计该书理论依然可以应用的一些主要方面。<sup>①</sup>

三十多年过去了，经济学家们再度面临一个一百周年纪念。一百年以前，1810年1月，出现了《金块的高价》一书，它是李嘉图对经济著作的第一个正式贡献，也是他从事他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门科学的一个开端。

很明显，这两次庆祝的性质是不同的。一个是对一本书的纪念，另一个是对一种影响的纪念。当然，这两个周年纪念日所表现的显著差别是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同等重要的。亚当·斯密是一个有造诣的学者，杰出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伙有影响的学者和政论家的中心人物；李嘉图则是一位从事自学的实行家，刚刚从对日常事件的偶然关心发展到一心钻研经济问题的有显著成就的金融家。《国富论》是一部正式的

---

<sup>①</sup> 《会议记录》(1881年)，第3卷，第77页，记载了会议的情况。政治经济学会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一篇完整的报告，这本小册子现时已很少见。



经过多年写作而分为两卷四开本的煌煌巨著，学者们都认为它“可以和任何一种已经出现的科学著作相媲美”，<sup>①</sup>并使它的作者获得一个经济学作家所能享有的那种不朽的声名；<sup>②</sup>《金块的高价》则是一本大约有四十页的印刷粗糙的小册子，它是在灵机一动的情况下仓卒写成的，“对别人已经提出的精彩论证并没有什么补充”，<sup>③</sup>并且早已被淹没在当时争论的激流之中了。

李嘉图在刚一跨进经济科学领域的时候，虽没有什么划时代的贡献，但他对经济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就这种影响的性质和范围来说，对这本处女作举行一百周年纪念是适当的。这次纪念的特点是要对他做一次认真的评价，并在一个学术环境里，要向对李嘉图经济学虽在解释上有一些分歧，<sup>④</sup>但早就以同情著称的一群学者们，试图回答麦克库洛赫多年以前向英国经济学者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李嘉图对政治经济科学究竟增加了哪些主要论点？”<sup>⑤</sup>

李嘉图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者，在我们论述他的生平、著

---

① 见亚当·弗格森 1773 年刊行的《文明社会史》第四版的脚注；参看约翰·雷的《亚当·斯密的生平》(1895年)，第 264 页。

② 詹姆斯·邦纳博士在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对亚当·斯密的赞语。

③ 见《金块的高价》的序言。在这本小册子第四版修订本内，李嘉图将这篇有趣的序言删去了。麦克库洛赫在编订《李嘉图文集》时曾经加进这篇序言。

④ 邓巴教授在 1887 年 7 月份《经济学季刊》发表的《李嘉图对实际材料的运用》一文，作为研究李嘉图理论著作的起点，也许仍有帮助。

⑤ 1838 年 12 月 6 日政治经济学会会议；见《会议记录》(1882 年)，第 4 卷，第 137 页。

作和影响之前，研究一下反映在他的生活和著作中的当时情况和思想背景，似乎是非常重要的。先天的智慧和切身的环境是个人传记的两个方面。但是一个人在一生的活动中，也受到支配那个时代的比较强烈的一般思想和行动力量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对李嘉图在经济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进行公正的评价时，既要考虑他一生切身的经历，也要考虑到他一生中社会上一些较大的变动。

李嘉图生于1772年，死于1823年。正象亚当·斯密经历了十八世纪中间的五十年一样，李嘉图的一生占据了十八世纪的末一个二十五年和十九世纪的头一个二十五年。这五十年的历史介于美洲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反动的末期，也是1775年伦敦票据交换所成立到1825年经济恐慌的时期，也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到1825年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的时期。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这是产业革命的五十年；对于政治史学家来说，这是拿破仑发生影响的半个世纪；对于经济思想史学家来说，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黎明时期。

假使我们不敢冒昧地说这半个世纪是一个历史时期，或不认为它是一个经济时代，而只是单纯举出那些影响生活和思想的基本要素，那么，非常明显，至少有三种现象具有极其重要和广泛的影响，因而它们自始至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支配了这个时期。这三种现象就是农业的纷扰，工业的发展和金融的活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从1775年到1825年，英国所产生的不论在多大程度上牵涉到经济事件的知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无不反映这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那时，农业家

正在经历着非常的变化，并吵吵闹闹地对这些变化发出怨言。制造业者正在蓄积巨大的利润，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的生存都有赖于保持这样大的利润。消费者正在被沉重的捐税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长期债款膨胀到这样一个程度，使国家信用有陷于崩溃的危险。这些事实都活生生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李嘉图背景的地方呈现出来，它们构成李嘉图思想发展过程中超越一切的根本要素。

这几种现象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拿破仑战争的进展和结局可以找出这一连串事件的线索。五十年的斗争，不完全的恢复，战争的再起和缓慢的复兴之所以可能，是由于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国家资源的巨大增长。1750年的英国一定在最初阶段就会被这种消耗元气的战争所打垮。英国竟然可以忍受住下半个世纪的惊人负担，并从这场持久力的竞赛中赢得最后胜利，这都是工业大大发展的结果。工业发展引起了农业生活的根本变化，也带来了捐税和债务的沉重负担。

在1775年，除了极端季节性变动外，英国仍然是一个谷物输出的国家。从1780年到1790年的十年期间，每年谷物剩余已经减少很多。在其后的十年期间，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谷物输出完全停止。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及战后的五年当中，仅谷物一项的进口每年平均超过了五十万夸特。从1820年到1825年，由于大丰收的关系，不须再从国外市场购买粮食。但自此以后，重新开始大量输入。这十年的平均数字大大超过了前些年数字。因此，从1775年到1825年，尽管英国扩展了耕地面积并改进了耕种方法，它也没有达到自

给自足的目的。英国实际上没有生产出多余的粮食，因而每年必须输出相当数量的工业品以换回它所缺乏的食粮。<sup>①</sup>

其结果是，英国的农业家及其同情者们，为了把国内谷物价值保持在一个笼统叫做“有利价格”的水平来保护国内市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错误的保护贸易立法——有时造成国内市场的供给过剩——加剧了这种斗争。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主阶级也使斗争变得十分激烈。议会和舆论为什么对农业家们的怨声十分敏感，可以从这里得到解答，这种情形造成了影响半个世纪经济生活的农业纷扰。

这种表面上的食粮不足，并不是由于英国耕地绝对缺乏或地力枯竭。假使必须的话，英国很可能自给自足。英国从国外输入谷物是由于英国工业有着优越的生产力。这符合于经济分析所提出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现在已成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国际贸易理论了。英国由于工业非常发达，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且价格低廉，因此，将工业品输出到其他国家来换取谷物，比它自己生产粮食更为有利。

在每一册英国社会史中，至少在表面上都阐明产业革命的几个连续阶段：机器，工厂制度，资本主义组织。很多与劳动过程有关的技术发明和自然发现，正在越来越甚地改变着英国工业的整个形式和面貌。一定的劳动力，在新的条件下，使用新的工具，可以生产出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按每人平均计算的产量。此外，劳动力的数量本身也在增加，这种增加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人口以加快的速度在增长，其中

---

<sup>①</sup> 见波特尔：《民族的发展》（1851年），第139—140、149页。

有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被吸收到工厂中去了。

旧的家庭工业制度的衰落和工业生活以农业生活为牺牲而取得的迅速发展，意味着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阶级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丢开这种变化不谈，显著的事实是，最终决定欧洲政治命运的国家资源惊人增长的真正原因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在滑铁卢一役<sup>①</sup>的胜利，是由于它拥有烟囱林立的工厂而赢得的。但是人们也许没有那么清楚理解到的，且对那一时期的文化史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上已经普遍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的抵抗力量有赖于它的工业的繁荣和保持工业利润水平不使下降。这种看法没有象农业方面的怨言那样大声地呼喊出来，因为新兴的工业既没有政治影响，也没有显著的社会地位。但这种看法在商业界和金融界是普遍存在着的，成为经济思想的真正核心。

工业发展带来了金融活动，正如它带来了农业纷扰一样。以工业利润形式取得的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量变成了舰队和陆军，因而有可能和拿破仑进行长期的斗争。借助新近提高的私人金融的效率，英国经受了空前的捐税和举债的严重考验。就捐税而论，皮特<sup>②</sup>和他的后任一直希望用每年的收入来偿付当前开支。这种枉费心机的企图大大加重了现有捐税的负担，而大部分捐税负担是沉重地落在商人的肩上。<sup>③</sup>因此捐

---

① 滑铁卢是比利时的一村，1815年英将威灵顿在此击败拿破仑，这一战争为近世史中有名战争之一。——译者

② 皮特(1759—1806年)，在1783—1801年和1804—1806年两次出任英国首相。在他第二次当政时，拿破仑在法国称帝。——译者

③ 见坎宁安：《英国近代工商业的成长》(1892年)，第551页。

税,除了与它本身有关系的事情之外,就以一种新的有时是粗糙的形式成为货币贬值,农业萧条和工业疲弱所带来的许多社会灾难的替罪羊。

国家岁入的长期不足,是靠大量发行公债来弥补的。从1793年战争开始时起,政府每年都要举债;国库券和海军债务经常由短期转为长期。1793年前,英国的长期债款为238,231,248镑。到1802年,总数达到567,008,978镑;1810年,达到734,787,786镑;1816年,达到1,003,768,694镑。在所增加的765,537,445镑中,658,506,728镑是新的债务,107,030,717镑是由短期转为长期的债券。此外,英国政府还替德皇担保,在英国借到两笔款项,替葡萄牙担保借到一笔款项。爱尔兰也一再要求英国贷款。<sup>①</sup>

一方面由于日益膨胀的工业利润寻求可靠的投资,一方面由于困窘的财政大臣们的无履需求,因此就产生了私人金融组织,英国之开始成为世界资本中心,是和这一点有直接联系的。从下面的事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转变。在半岛战争<sup>②</sup>的时候,英国兵站总监为了运送硬币给战地士兵,曾尽了绝大的努力,仍然无效。而在滑铁卢战役中,通过当时新兴的、刚刚得势的金融业者的广泛国际联系,完全利用商业汇兑,就非常方便而迅速地支付了士兵的薪饷和国外的补助金。<sup>③</sup>

---

① 见汉密尔顿:《国债的探讨》(1818年第三版),第105、320—322页。

② 指1804—1814年英国与葡萄牙人联合在西班牙和法国军队进行的战争。——译者

③ 见赫雷斯:《约翰·赫雷斯回忆录》(1880年),第1卷,第86、104页及附录二。

当我国经济生活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受《国富论》支配的。在《国富论》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休谟曾感慨地说，读亚当·斯密的著作，须要用很多的思考，因此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刚读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读者，很可能觉得这位苏格兰哲学史的著作过于冗长。其后不久，日益流行的斯密著作，似乎暂时受到了法国革命的限制。<sup>①</sup> 经济学说，特别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终于被认为是和法国原则和革命精神相符合的。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在1793年向爱丁堡皇家学会宣读他的《亚当·斯密回忆录》的时候，放弃了他原来打算对斯密的意见做一个详细报告的计划，因为在那个时期，他说：“甚至很有才能和学识的人们，也常常有意识地将纯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说，与当时不幸偶然激动公众情绪的有关政治原则的讨论，混淆在一起。”<sup>②</sup>

当然，那本书的实际需求并没有受到不利的影 响。当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四开本书在卡德尔书架上蒙上尘土的时候，斯密的书却很畅销，1799年印出了第十版。该书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影响同样是相当大的。从1783年以来，议会辩论一再引用《国富论》。几乎从发行的那一天起，它对国家的财政政策就发生了直接的影响。皮特在1792年说：“我相信，每一个有关政治经济制度和商业史的问题，都可以从斯密的丰富知识中，从他的细致和深奥的哲学研究中得到解答。”<sup>③</sup> 1799年普尔特尼称颂“斯密博士的权威，认为他说服了

---

① 见雷：《亚当·斯密的生平》，第29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90—291页。

当代并支配了下一代”。<sup>①</sup>

但是，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纯经济理论在国内一般人的心目中还没有明确定型。十年之后成为口头禅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尚未出现，甚至在文化界对经济这门学科的目的和范围也没有很多认识。正如当时一位谨慎的学者所说的，“事实上，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下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并在当前社会情况下，反复说明和详细实施斯密的理论，以便使这门科学获得广泛的重视，使这些理论获得人们的接受。”<sup>②</sup>

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在1800年冬季及其以后的八个学期中在爱丁堡大学反复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有效地执行了这一任务。在这一时期的大部时间内，这些讲演是英国学者所能听到的唯一有关经济学原理的详细阐述。这条道路也并不是很平坦的。政治反动的空气仍然到处弥漫着。科伯恩勋爵曾说过：当斯图亚特公布他的课程时，单单“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就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其中所包括的问题要涉及政体，不少人希望斯图亚特不致陷入危险的命题中。”<sup>③</sup>

但是，由于斯图亚特具有动人的风格，他的批判性阐述明白有力，以及他的一般主题适合时宜，他把不少听众吸引到他的讲堂里。自此以后，这些听众多少都和他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他们的数目虽然不大，但在当时都是比较有前途的，以后

---

① 见巴克尔：《英国文化史》，第1卷，第四章，注61。

② 见维奇：《斯图亚特回忆录》，载汉密尔顿编《斯图亚特文集》（1858年），第10卷，第51页。

③ 见科伯恩：《我这一代的回忆》（1856年），第174页。



的成就也确是显著的。听众“不只是正在受大学教育的大学生，而且大部分是有经验的成年人，特别是律师公会的会员们”。<sup>①</sup>听讲学生的数目平均不到五十，但名单中却包括了下面这些名字：如弗朗西斯·霍纳，西德尼·史密斯，弗朗西斯·杰弗雷，劳德台尔伯爵，亨利·利伯恩，亨利·布鲁厄姆，麦克维伊·纳皮尔，阿奇波德·阿利森，詹姆斯·穆勒，以及托马斯·查默斯等。这些人对下一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sup>②</sup>

杜格尔德·斯图亚特与其说是一位温顺的阐述者，倒不如说是一位独立的批判者。而且其他方面也对亚当·斯密的某些结论提出了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异议。阿瑟·杨格认为“没有比这更精彩的著作”，但“其中有害的错误也最多”。<sup>③</sup>詹姆斯·安德森竭力鼓吹谷物条例中奖励金的作用。杰里米·边沁对高利贷法的失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辩解。马尔萨斯揭露出亚当·斯密论证济贫法的缺点。劳德台尔尖锐地指出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1803年，弗朗西斯·霍纳在拒绝一家出版商请他给新版《国富论》写一些注释的时候，写信给托马斯·汤姆森谈到他拒绝这一请求的动机：“即

---

① 见《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文集》中《斯图亚特回忆录》，第10卷，第55页。

② 斯图亚特的讲演对于英国思想界的影响可以由乔治·普赖姆作证明。普赖姆于1816年在剑桥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而且以后每年反复讲授。在英国大学中，这似乎是首次承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科（当然，马尔萨斯在黑利伯里学院的活动除外）。普赖姆说：“斯图亚特的讲演受到人们很大的注意。在我们的大学中就有很多人从英国南方到爱丁堡过冬，为的是听讲。”见《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提要》，1819年第二版，序言，第7—8页。

③ 斯蒂芬斯：《英国功利主义者》（1900年），第1卷，第77页。